

防御性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悲剧^{*}

李江春

【内容提要】 作者旨在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防御性现实主义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命运如何?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小问题: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下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面临哪些生存压力?这些生存压力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会造成哪些影响?作者认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面临五种生存压力: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进攻的诱因;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经常遭遇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攻击;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被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包围;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几乎无法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合作;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军力通常在整体上或在关键指标上落后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在这些生存压力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生存质量堪忧,在重要的物质利益和国家的自主性两项指标上的表现难如人意。作者采取了案例分析的方法,以中国宋朝和波兰为例,论证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困境。

【关键词】 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生存质量;中国宋朝;波兰

【作者简介】 李江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上海 邮编:200433)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1)11-0099-25

^{*} 感谢唐世平教授的指导,张宇燕、秦亚青和叶江教授的鼓励与批评使本文增色不少,在此一并致谢,同时也要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批评意见,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

一 前言

自从1991年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在其《帝国的神话: 国内政治和国际野心》一书中提及侵略性现实主义(即后来所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两个概念以来,^①现实主义阵营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展开的热烈争论一直持续至今。中国学者唐世平概括和总结了这场争论,^②并倾向于用时间的维度来理解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他认为,人类社会是社会进化的,国际政治理论具有时代性,人类经历过丛林时代(即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这两个时代分别适用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③

既然如此,那么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采取防御性现实主义时,其结果将会如何?这个问题当然重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我们应该充分关注这段历史。第二,再没有比一个国家能否生存、生存得好还是坏更为重要的了。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并不遵循那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其命运如何,应该引起我们的格外注意。第三,只有把现有对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研究推进到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我们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防御性现实主义。

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命运,唐世平的回答是“意味着等待灭亡。”^④不过,这个回答缺乏详细的论证来支撑,也不够准确。为弥补这些缺陷,本文一方面将深入探讨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⑤悲惨命运的内在机理,另一方面也提出

①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1–12. 斯奈德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二分法,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早就为这一研究奠定了基础,参见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67–214. 更早的思想萌芽可参见 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67, No. 4, 1952, pp. 481–502.

②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Chap. 1.

③ 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0–150页;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5–31页;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从更广义上看,社会进化范式是国际政治理论中正在形成的新范式。本文之所以用“时代”替代唐世平所说的“世界”,是因为前者比后者能更准确表达时代性的特征。

④ 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4页。

⑤ 本文使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这两个概念同样来自唐世平。在他看来,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是受进攻性现实主义指引的国家,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则是受防御性现实主义指引的国家;或者说,除极端情况外,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为了寻求自身安全而有意加害别国,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则没有为了寻求自身安全而加害别国的借口,参见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p. 31.

国家的生存质量这一概念,并设定两项指标,以恰当地评价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在存续期间的表现。同时,本文还指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可以选择依附性生存策略,在这种情形下,它可能没有被灭亡之虞。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建构,从五个方面解释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悲剧为什么会产生,随后,提出国家的生存质量这一概念并设定两个指标加以测量。第三、四部分是案例分析。其中,第三部分揭示中国宋朝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性格,指出宋朝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选择防御性现实主义是错误的,它的生存质量堪忧,最终被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消灭;第四部分回顾了波兰在17世纪中叶被迫转型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及其悲惨遭遇(与宋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 防御性现实主义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困境

在进一步论证之前,我们首先要承认一个事实:无论哪个时代,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都会共存,即使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大国身上,也是如此。

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是崇尚进攻的时代,进攻被认为是能生存下来、生存得更好的战略,或者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基于进攻的战略偏好,战争变得非常普遍,与此呼应的是战争的合法化。^①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冲动总是难以抑制,而战争一旦爆发,胜利者就会坚定进攻的信心和勇气,直到遭遇失败为止;失败者则会积蓄力量,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于是,战争在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循环。^②

在这样的时代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面前,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命运将会怎样?或者说,防御性现实主义是否适合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生存?依靠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样近乎直觉的思维,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确面临这样的困境,无法适应那个残酷的时代,但其原因和表现要比我们现在认识到的复杂得多。为提供更好的解释,本文将前述问题拆解为两个小问题: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会面临哪些生存压力?这些生存压力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造成哪些影响?

^① 直到1928年《白里安-凯洛格公约》(Briand-Kellogg Pact)的签署,蓄意发动战争的行为才被认为非法,人类经历了多少战争磨难才终于走到这一步,尽管它很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变成废纸。

^②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间关系的研究贡献良多(虽然他的论证过于粗糙),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但该议题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故不予讨论。本文也不打算讨论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在那个时代的国际政治中处于边缘地位。

然后分别给出答案。

具体来说,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面临的生存压力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防御性现实主义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进攻的诱因。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知道,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很少主动出击。因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几乎没有被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入侵的后顾之忧,可以大胆向后者发动进攻。更何况,进攻性现实主义还清楚,在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土地上总有自己需要的东西,占为己有岂不是更好?也许最重要的是,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要么弱小,要么实力没有获得较大提升,要么处于衰退之中,这些都让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进攻行为充满合理性。对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发动进攻的诱惑力如此难以抵挡,以至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也可能考虑将自己化身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如果它们能做到的话。

第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往往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战争演练场。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来说,不断发动对外战争,攫取发展动力,打造通往未来美好前程的通道是其成长的逻辑,因此,它的对手无论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还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其实并无不同,——反正都是要对其“加害”的对象。与此必然相连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将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开辟为战争演练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有时会通过一场战争就能重创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但更多时候,需要发动多次战争才能占据上风,直至消灭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尤其是在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具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时。这样,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就在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身上找到了演练各种战略、战术以及为此目的而建立和完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的机会,使自己更加成熟。

第三,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对手——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往往不止一个。即使在古代相对封闭的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也会与多个国家相邻,当进攻性现实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通行法则时,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周边就充斥着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到了近现代,战争的地域范围扩大,进攻性联盟不仅在本地区形成,也跨越了地区层面到达全球范围。我们可以打个恰当的比喻,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犹如羊掉入了狼群。不可否认,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之间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这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可资利用的机会,但这种机会通常不会长久,因为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除了以利益拱手相送以外,不可能有太多的筹码来抑制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冲动。而在不断变换盟友的联盟政治中,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往往实力不济,无足轻重,最有可能被抛弃。

第四 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几乎无法与把矛头对准自己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进行合作。^① 既是合作 就需要双方付出代价。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希望以战争或战争威胁来获取在平等谈判时得不到的东西 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合作无法满足这种欲望。而且 即使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不把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当成敌人 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也会把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当成(潜在)敌人 而(潜在)敌人之间的合作是机会主义的 即使有也稍纵即逝。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面前 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缺少利诱对方遏止进攻冲动的手段和机会 只有妥协或者不妥协。

第五 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军力通常在整体上或在关键指标上落后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战争的冲动培育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全面、迅速提高军力的积极性;理性的计算要求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军力强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军力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国际政治生活中具有压倒性的重要地位。或许 我们可以换种说法:军力几乎可以与判断国家强弱的综合国力或国家竞争力画等号。这时 经济实力也就不那么重要(至少在短期内)。^② 在冷兵器时期和热兵器对付冷兵器时期(当然都属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尤其如此。骑兵是冷兵器时期进攻的显著标志 热兵器则是对付冷兵器的最好武器。因此 拥有骑兵但整体上看起来相对落后的国家会对先进国家带来沉重 甚至致命的打击 依靠热兵器对付冷兵器也具有同样效果。这并非唯军备论 而是对历史的客观解读。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 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如果应对得当 自然可以延缓、减轻这些压力 但还是没有办法完全解除 因为它们是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与生俱来、贯彻始终的。如此难以承受的生存压力之重 这在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反映出极低的生存质量。^③

国家的生存质量是对国家的生存状况的一种评价。一直以来 国际政治学家们习惯于从质的角度来分析国家的生存和灭亡 对生存质量的研究却尚未启动。^④ 我们

① 这里的合作是指军事合作。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 其他领域的合作对军事决策和行动的影响无足轻重。

② 遗憾的是 国际政治学家们过于关注离我们最近的历史事实 都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的经典论著包括 [美]汉斯·摩根索著 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利与和平的斗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美]肯尼思·华尔兹著 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 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美]保罗·肯尼迪著 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③ 感谢秦亚青教授鼓励笔者扩充对国家的生存质量的研究。

④ 目前 有关权力、安全和财富的研究可以纳入生存质量这一主题 但是 只有把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因素整合起来 并找到恰当的评价指标 才称得上是一项有关生存质量的研究。

必须改变这一现状。实际上,探究国家的生存质量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第一,任何存在过的国家都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国的生存质量并不一样,这是不争的事实;不了解生存质量,就不会对国家有深切的认识。第二,存亡是质的表现,生存质量是量的展示,后者的重要性不低于前者,应引起重视。第三,只有仔细研究生存质量,才能了解国家存亡的趋势和原因。第四,国家的生存质量和人民的生活质量很多时候是一致的,不过,二者相互背离的情形也屡见不鲜,尤其是在战争环境中。所以,把国家的生存质量这一问题提出来,并且厘清它和人民的生活质量的关系尤为必要,借此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国家和人民的关系。

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国家的生存质量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多领域,但具体到特定时代的特定国家,我们并不一定需要涉猎所有领域,就能给出正确的评价。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由于国家的生存没有切实保障,军事的比重就尤为突出,否则,其他一切都是奢谈。这与前面关于军力几乎可以和综合国力或国家竞争力画等号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该如何测量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在这种环境中的生存质量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是否将本国的军备、金钱、领土和人口等物质利益拱手相送。第二,是否具有内政外交的自主性。^①重要的物质利益和自主性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除非不得已(通常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军力不够强大,不足以威慑、挫败外敌的大规模入侵或入侵威胁),没有哪个国家会自愿把这些天然属于自己的东西交给别的国家。对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来说,最理想的情形莫过于两项指标都完好无损。然而,由于前述生存压力的存在,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总是生活在受到大规模入侵的担忧和现实之中,而自身实力又有所欠缺,要实现这些目标几乎不可能,必须以付出重要的物质利益和/或自主性为代价,才能求得安全。通过牺牲重要的物质利益来维护自主性是惯常的做法,而结果如何则另当别论;自主性一旦被破坏,接踵而至的可能是丧失重要的物质利益。

领土、人口、地理位置、战略物资、科技水平、阶级结构、历史和领导能力等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因素及其组合造就了不同的国家,造就了不同的生存战略。在强国和弱国的二分法面前,人们对前者要求苛刻,不自主独立就不符合其身份和地位,对后者相对宽容,依附他国——国家表面上得以保存——算不上什么耻辱的事。推崇自主性的国家可能会屡遭入侵,被强敌所灭;用自主性来换

^① 本文所指的国家并没有站在与市民社会相对的角度来界定,因而这里不使用国家自主性的概念,以免引起混淆。

取大国安全庇护的国家反而能保全下来,何者更好,很难泛泛而论,只有针对具体情形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进一步来看,就算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两项指标都亮红灯,委身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也可能使之获得足够的生存时空,最终的结果不见得就是灭亡。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生存质量。跟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也会战败并丧失重要的物质利益甚至自主性,可是,在整个存续期间,意图加害他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总是念念不忘掠取额外利益(包括曾经受损利益),而且获得成功。因此,在总体衡量之后,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重要物质利益呈增长之势,自主性也随着利益的膨胀而愈加稳固。总而言之,其生存质量优于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即便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寿命更长——这也反衬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悲剧。

下面,本文将以中国宋朝和17世纪中叶后的波兰为例,分别论证前述理论。这两个案例在时间上跨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在地理上各处东西两端,凸显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多样性和代表性;它们先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辉煌经历可以强烈地反衬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惨痛教训。

三 宋朝:转向内在的宿命

宋朝太祖、太宗时期,正值开国之初,武风极盛,两朝皇帝延续昔日武功,先南后北,发动一连串征讨战争,南方诸国几乎尽入版图,最终连北汉也收入囊中。这时的宋朝崇尚霸道。公元975年,南唐使者徐铉见宋太祖,认为“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宋太祖回答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①979年,宋伐北汉,辽景宗遣使问原因,宋朝答复“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②完全不把辽朝放在眼里。灭了北汉之后,宋朝又大举进攻最强大的对手——辽朝,有胜有负,直至986年岐沟关之战失利。从此以后,它再没有大规模地征服北方,而是转向内在,^③专事防御(偶有进攻)。

从公元960年至公元986年,宋朝的进攻历时不过26年,只占其全部统治时间319年的8.15%,因此,总体而言,可以说“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卷十六,第49页。

② [元]脱脱等《辽史》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九,第101页。

③ 刘子健用“转向内在”这一表述指称宋朝政治和文化转型,参见[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这里借用此说来描述宋朝的军事转型。

击,用意始终在防守”。^①这已是公论。

(一) 统治的铁律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宋太祖唯恐唐朝节度使拥兵太重,君弱臣强,帝王易姓的历史重演,遂收兵权、削藩。对张光翰、赵彦徽、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和张令铎等一批节度使,“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②使他们到头来成为没有兵权、无法造反的地方行政长官。宋太宗甚至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③“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④先祖若此,后世唯有顶礼膜拜。于是,防内甚于防外成为宋朝及至之后延绵不断的统治铁律。

防内甚于防外的理念渗透到军事领域之后,宋朝的一系列兵制就有了不同于其他大国的另类内涵。重禁轻厢(禁军守京师,备征戍;厢军镇诸州,承役使)、募兵(招募农民、失业流民和灾民终身服役)、枢密院和三司并立(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掌诸军)、内外相制(在京师和诸道各置人数接近的禁军)、更戍(禁军更番迭戍)和将从中御(皇帝战前制定战略,尽授纪律,遥控将帅,并派朝臣监督)等体现的是赵氏皇帝强干弱枝、对武臣处处设防的逻辑。这样的逻辑推演到最后便是褒文贬武。早在宋太祖时期,崇文抑武已经扎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初始的措施包括:保护文臣,重视文臣,任用文官掌管地方,尊崇儒学,重视科举,立碑告诫后世勿杀文臣士大夫。经由宋太宗发扬光大后,这一治国方略稳定成形。到宋真宗、仁宗时期,又衍生出以文驭武,达到某种极致。至北宋中叶已经完全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在枢密院和在外出征、驻守的军事体制中,文臣也逐渐成为主宰者,武将则沦为辅助性的副职、部将。终宋之世,崇文抑武的风气一开,再也收不回来,即使在风雨飘摇的南宋小朝廷,它同样受到推崇。^⑤

如此氛围纵容了后太宗时代赵氏子孙怯战求和、不思进取的习性。比如,宋真宗

^①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6-97页。更准确地说,宋朝的防御是消极防御。相关论著有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1-334页;《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第四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171页;张洪久《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317页;杭侃《两宋——在繁华中沉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4-35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册 卷二,第49页。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 卷三十二,第719页。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 卷三十,第678页。

^⑤ 参见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51-303页。

就认为,“祖宗开疆光大,当谨守而已,不必劳费兵力,贪无用之地”;^①他还下手诏给王继忠“朕丕承大宝,抚育群民,常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②以尽快达成“澶渊之盟”。宋高宗为防止金把徽、钦宗放回来抢夺帝位,不惜委曲求全,“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③并不断释放甘于偏安一隅的求和“善意”,终于达成“绍兴和议”。宋高宗之后,宋孝宗本是有雄心壮志的皇帝,无奈一贯消极的太上皇在背后掌控,只得“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④既然作为最高策者的皇帝如此,权臣中投降派、求和派层出不穷也就理所当然了。由于长期共事,他们消极对外的本事可以说得上是君臣相长(参见表1)。

表1 宋朝最消极对外的君臣同朝

君臣 时间	宋徽宗	宋高宗	宋宁宗	宋理宗	宋度宗	宋恭宗
	蔡京、童贯	秦桧	史弥远		贾似道	
权臣掌权时间(年)	1103 - 1126	1138 - 1155	1207 - 1233		1259 - 1275	
皇帝在位时间(年)	1101 - 1125	1127 - 1162	1194 - 1224	1224 - 1264	1264 - 1274	1274 - 1275

皇帝和权臣如此醉心于和平与权位的结果是,改革派、抗战派遭到无情打压,甚至断送性命(参见表2)。

表2 宋朝改革派、抗战派的命运

保守派、求和派	改革派、抗战派
王钦若	寇准(罢相)
宋仁宗、夏竦	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被解职)
司马光	王安石(两次罢相)
宋钦宗、宋高宗	李纲(三次被解职)
宋高宗、秦桧	赵鼎(罢相,绝食身亡)
宋高宗、秦桧	岳飞、韩世忠、张俊(罢兵权,岳飞被杀)

(二) 错误的选择

公允地说,宋朝抛弃黩武精神,打造文治国家的执著深具现代意识,如果它活在现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三册,卷六十三,第1413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三册,卷五十七,第1269页。

③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卷二十三,第484页。

④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甲集卷二十,第469页。

在无疑令人向往。可惜的是,它错误地留在了另外一个时代。

1. 南方的诱惑

宋朝生存的时代,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战争是那个时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国家在不断的战争中诠释着存在的意义。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279年,以今天中国版图内曾经存在的国家为限,一共爆发了551场战争,^①平均每年约1.73场。

在这样的时代,以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来演绎“夏则出随水草以居,冬则入处其中,迁徙不常”^②的北方游牧民族觊觎宋朝良好的生存条件——气候干燥期更使他们进攻和征服的冲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③——正如宋初试图构建大一统的帝国一样恰当。面对宋朝高度发达的文明,虚心学习远不如直接占有那样令人怦然心动。一俟宋朝转向防御,北方游牧民族就再也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无一例外地先整合本族各部,然后平定北方,最终将进攻目标对准南方的中原王朝:谁能征服中原王朝,谁才是最强者。毋宁说,征服中原王朝成为草原部落最高的生存目标。

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可汗,不断发动统一塞北、染指中原的战争。947年,耶律阿保机的次子耶律德光在原后晋都城开封建立辽国,依汉例登基,就是想做中原的皇帝。即便实力相对较弱的西夏,也推行“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鹞锐兵,然后长驱南牧”^④的进攻性战略,个中缘由,就像李元昊对李德明所说,“勿事中原……所得俸赐只以自归,部落实繁,穷困颇甚,苟兹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习练干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上下具丰,于我何恤。”^⑤

金朝和元朝则是最具攻击力、对宋朝威胁最大的两个国家。它们的进攻本性赫然见于国号。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即皇位,改名旻,国号大金。为什么取国号金?旻说道“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唯金不变不坏”,^⑥其灭辽(而后侵宋)之心昭然若揭。1271年,蒙古改国号元,这取自《易经》“大哉乾元”,^⑦以表明要取代宋朝为正统的决心。其实,蒙古人追求的“天下”何止于此,“其野心勃勃

①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史》附卷下,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② [元]脱脱等《金史》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一,第3页。

③ 参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18页。[法]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页。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卷七,第47页。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五册,卷一百二十四,第2925页。

⑥ [元]脱脱等《金史》第一册,卷二,第26页。

⑦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孙颖达疏,余培德点校《周易正义》上册,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的目标远远超过以往纯粹汉人的国家曾想达到的任何要求”^①“把所有已知的世界都当做了他们‘未来世界帝国’的一部分”。^②

2. 战争的锤炼

以公元986年为分界线,辽朝的嗜血性因宋朝挑衅失败而极度膨胀。打代理人战争是其最初的体现。从987年开始,李继迁在辽朝的援助下,频频袭击宋朝,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宋太宗驾崩后,辽朝径直扑向宋朝,接连发动瀛莫、遂城和望都战役。1004年,辽圣宗和萧太后统率辽军20余万犯宋,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抵达澶州,宋真宗御驾亲征,辽损失惨重,与宋讲和,开启两国长达118年的和平之旅。在此期间,辽朝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色彩虽有所减退,但依旧浓厚。1042年,正值宋夏战争激烈进行,辽举兵威胁,向宋索要关南十县,宋朝正吃败仗,只得“岁增银、绢十万两、匹”。^③1073年,辽逼宋重新划定蔚、应、朔三州地界。

宋朝建国时,李氏执掌夏州地方政权。公元982年,因不满族兄李继捧对中央政府过于软弱,李继迁北逃,不断侵扰宋朝边境,多次击败宋军,特别是在1002年攻陷灵州,迫使宋朝不得不承认李继迁事实上的独立。1006年,为安抚李继迁的继承者李德明,宋李订立和约。以此为契机,李氏在当地苦心经营30多年,实力大增,遂于1038年建立西夏王国,旋即发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砦三大战役,大获全胜。后来的绥州、灵州、兰州、平夏城和统安城等重大战役,两军互有攻守,互有胜负。

女真破辽茧而出,建立金,与宋灭辽,即进兵犯宋,掠走宋的半壁江山,又乘胜追击,几近捉拿宋高宗,不过,宋军在黄天荡、富平、和尚原、襄阳和仙人关等地的军事胜利使金吞宋的企图化为泡影。金朝并没有就此止步,只是稍事歇息,于公元1139年卷土重来。这是一次失败的进攻,金朝却用谈判桌上的胜利来弥补。此后20年,既是宋金和平时期,也是金朝为下一次进攻做长期准备的时期,特别是在1149年完颜亮弑君夺位之后。1161年,完颜亮南侵,以失败告终。接下来,金朝在击退宋朝的两次北伐中跨入13世纪,以两次南侵还以颜色。此时的金朝,已为强弩之末,再无能力一边抵御蒙古,一边在南宋领土上建功立业。

公元1206年,蒙古人建立汗国,开始了四处征讨的旅程。它的进攻战略很明确:先毁西夏,接着联宋破金,最后灭宋。灭金次年,蒙古兵分三路,大举攻宋,虽有斩获,

①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②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20页。

③ [元]脱脱等《辽史》第一册,卷十九,第227页。

但也遇到宋军的顽强抵抗,战争进入拉锯状态,持续 20 余年。1257 年,蒙哥汗再次大规模南侵,不久便梦碎钓鱼城。1260 年,忽必烈登汗位,励精图治,14 年后由襄阳沿江而下,发起对南宋的致命一击。宋朝以防御见长,守土有方,然而,蒙元灭宋之志始终不移,愈挫愈勇,历经 40 余载,终成正果。

3. 北方的悍邻

尽管辽、西夏、金和元的寿命远不及宋朝那么长久,但它们不辞劳苦、前仆后继,竞相挥师南下,致使宋朝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始终处于北方邻居的半包围之中,要防备不止一个敌人的侵袭。而且,这些国家也会联合起来对付宋朝。辽和西夏的长期联合表明,两国之间的龃龉为征服宋朝的欲望所掩盖,令宋朝的国防压力陡增,远远超过汉唐。金朝两次拉拢西夏攻打宋朝,一次让西夏出兵牵制河东宋军,攻占宋镇威城;一次割地诱使西夏向麟、府、丰三州进攻,使宋军无法东调(参见表 3)。

表 3 宋朝及其北方敌人

国家 时间	辽	西夏	金	元
时间	947 - 1125 年	1038 - 1227 年	1115 - 1234 年	1271 - 1368 年
	宋 (960 - 1279 年)			

必须指出的是,大国崛起是一个过程,称帝建国只不过是北方民族羽翼丰满,确立大国地位的标志,严重破坏宋朝外部生存环境的开端。实际上,除了辽朝(先于宋朝建立)以外,无论宋朝的统治者是否意识到,西夏、金和元正式建元前的政治实体就已经对宋朝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

4. 权宜的合作

如果非要找一个词来概括宋朝及其北方邻国的心理状态,那就是恐惧:要么担心对方攻击、消灭自己,要么担心对方出尔反尔。心存戒备之余,利益错杂之中,合作姗姗来迟;基于恐惧的合作,即使不扭曲、挤压共同利益,也会缩短共同利益存在的时间。在宋朝及其(潜在)敌人——辽、西夏、金和元之间,合作的基础异常脆弱、一击即溃,合作的机会微乎其微、倏而便逝,合作的指导思想是急功近利甚至是机会主义的。

这种权宜合作的模式,在宋金携手灭辽以及宋元联合灭金时表现尤为明显。宋辽长期和平未能消除各自的恐惧,合作遥遥无期,宋朝则苦苦等待复仇机会。公元 1111 年,马植献策,宋徽宗倾向于借助女真势力攻打辽朝。其后数年,女真人从辽朝身上取

得的赫赫战功让宋朝闻之动容。1118年,宋约金伐辽,金急于灭辽,表示同意。1120年,宋金达成“海上之盟”。1122年,辽朝希望通过免除岁币,与宋朝结好,但此时辽朝败局已定,宋朝不愿放过复仇的大好机会,断然拒绝。1125年,辽朝灭亡,宋金合作的基础荡然无存,金朝立即挑起战端。从此一百余年,两国再无合作的历史。1231年,已经建立横跨欧亚帝国的蒙古遣使来宋,商议联合攻打金朝。随后两国又有接触,达成联盟共识。这也是一次短命的合作。1234年,随着金朝的灭亡,宋蒙的“蜜月期”也宣告结束,蒙古继续挥军南下,此后宋蒙关系的历史,就是烽火连天的历史。和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宋金联盟一样,宋蒙联盟也是机会主义作祟的结果,宋朝尤其如此。宋朝不是不想吸取金灭北宋的教训,但金朝灭亡指日可待,宋朝实在抵御不了眼前的诱惑。

宋夏攻金同样遵循了权宜合作的模式。公元1214年,为报复金朝,西夏主动约宋攻金。1219年,西夏再次伸出友谊之手,但宋朝迟不发兵。1220年,两国一起攻打金朝,却配合失当。此后,西夏又三次约宋攻金,统统无果而终。宋朝和西夏虽是宿敌,但西夏因遭蒙古入侵金朝袖手旁观而迁怒于金朝,合作的契机终于出现。不过,宋朝知道,要撼动金朝的根基,西夏并非理想的合作对象,因而对合作三心二意、浅尝辄止。

5. 骑兵的落差

与宋朝相比,北方游牧民族的军备优势在于马匹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强大的骑兵部队,而且,骑兵还是主要兵种。“这一兵种,赋予了它胜过定居民族的巨大优势,就像火炮赋予近代欧洲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①因此,它们更具有进攻的本钱和自觉。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原王朝真正构成威胁的都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不是南方的农耕世界。

辽朝军队由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属国军和边境戍兵组成,^②其中以御帐亲军和宫卫骑军为精锐,两军骑兵合计达六十万^③,而精锐中的精锐,则数铁鹞,“其身披铁甲,而驰突轻疾,如鹞之搏鸟雀也。”^④这是契丹人建立辽阔帝国,甚至让宋朝纳贡的胜利之本。再看看西夏的军队,也是个精于骑射,能吃苦耐劳,他们“用兵多立虚砦,设伏兵包敌,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⑤其

①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第7页。

② [元]脱脱等《辽史》第二册,卷三十五,第401-435页。

③ 前者为五十万,后者为十万,参见[元]脱脱等《辽史》第二册,卷三十五,第401-402页。

④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资治通鉴》第十九册,卷二百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289页。

⑤ [元]脱脱等《宋史》第二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四百八十六,第14029页。

屡屡挫败宋朝也就不足为奇。金朝的骑兵还在辽和西夏之上,“每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每遇敌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先观阵之虚实,或向其左右前后,前队而驰击之,百步之内,弓矢齐发,中者常多,胜则整队而缓追,败则复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应变若神,人自为战,则胜”^①。战斗力之强可见一斑。就是这支军队,不但灭了辽,还拿走宋的一半河山。蒙古人更厉害,“正如早期哈里发国家控制了大约4/5的世界骆驼数量一样,早期可汗国家控制了大约一半的世界马匹数量”^②。“一旦发起进攻,大规模有组织的马力便会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取得军事优势。新马的不断补充,使运动战、消耗战和恐怖战成为可能,这是内部分裂、对自己的统治者发生怀疑、作战半心半意的定居世界所无法阻挡的。”^③无怪乎他们能以“以弓马之利取天下”^④。

相比之下,汉唐如日中天的骑兵在宋朝时却走向了黄昏。骑兵所需要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的蓟北之野,另一在西北的甘凉河套一带。在宋初开国时,这两个地方,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⑤因此,宋朝只有靠与西北、东北少数民族贸易和自己养一些品种低劣、难以胜任战骑的马匹来组建数量不足、战斗力低下的骑兵部队。而在主观上不重视骑兵建设,这是宋朝骑兵落后的更重要原因之一。^⑥

(三)失落的大国

宋朝一共存续了319年,在秦汉以后各中原王朝中,仅次于汉朝而位居第二,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它又继续延伸唐朝的上升曲线,以优秀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素质领先世界而永垂史册。“中华文明在宋元后期达到了它的三个高峰之一。在城市化、相对自由的政府、平时与战时的制海权、审美水平以及向现代科学的靠近诸方面,它胜过从前盛唐和后来清朝中期的繁盛。与同时代的印度、伊斯兰和东方基督教世界相比,宋代中国当然占据优势。”^⑦

然而,宋朝的这些辉煌成就并没有转换成军事优势,它始终饱受外患之苦,丝毫没

①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卷三,第19页。

② [美]S·A·M.阿谢德著,任菁等译《中国在世界历史之中》,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③ S·A·M.阿谢德《中国在世界历史之中》,第133-134页。

④ [明]宋濂等《元史》第四册,台北:鼎文书局1986年版,卷一百,第2553页。

⑤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99页。

⑥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第263-268页。

⑦ S·A·M.阿谢德《中国在世界历史之中》,第124-125页。谢和耐也认为,“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高峰。”参见[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有继承先前在这片土地上骄傲过的中华帝国的荣耀,“在中国历代王朝中,也许以最不追求帝国形象而引人注目……它的皇帝与政治家们显得非常软弱,他们更倾向于和谈而不是扩张,而且满足于牺牲无形的东西像王朝的形象,来达到物质生活与边界稳定的实在目的。”^①986年之后,宋朝转向全面防御,领土只见减少,不见增加,增加的只有和约和岁币,原来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朝贡转变成宋朝对北方国家的朝贡(参见表4),尽管宋朝还能在其他进贡国家面前展现大国风范。^②其间有志于恢复汉唐帝国荣誉者如王安石、岳飞等,也有韩侂胄这样的好大喜功者贸然北伐,但均告失败。黄仁宇甚至不无偏颇地说“要是不怕说得过于简单的话,我们可以概括地指出,全宋朝319年的纪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③

表4 宋朝的岁币

内容 和议	称谓		银(万两)	绢(万匹)	茶(万斤)
	宋	外国			
宋辽澶渊之盟(1004年)	兄	弟	10(1042年增至20)	20(1042年增至30)	0
宋夏庆历和议(1044年)*	君	臣	5	13	2
宋金第一次绍兴和议(1138年)	臣	君	50	0	
宋金第二次绍兴和议(1141年)	臣	君	25	25	0
宋金隆兴和议(1164年)	侄	叔	20	20	0
宋金嘉定和议(1208年)	侄	伯	30	30	0

注:加上日常“所赐”,则达到银7.2万两,衣著绢帛15.3万匹,茶3万斤。

幸而宋朝还始终保有大国俱乐部成员资格,有足够的实力来维护内政外交的自主性,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非交由外国操纵。就算宋朝甘愿以卑微之身侍奉它国,那也

① [美]戴仁柱著,刘晓译《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② 《宋史》有这样一段记载“东若高丽、渤海,虽阻隔辽壤,而航海远来,不惮跋涉。西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国,虽介辽、夏之间,筐篚亦至,屡勤馆人。党项、吐蕃唃廝囉董毡征诸部,夏国兵力之所必争者也,宋之威德亦暨其地,又间获其助焉。交趾、占城、真腊、浦耳、大理滨海诸蕃,自刘鋹、陈洪进来归,接踵修贡”。参见[元]脱脱等《宋史》第二〇册,卷四百八十五,第13981页。据周宝珠统计,宋朝时来朝贡较多的国家有:高丽41次、交趾45次、占城56次、三佛齐33次、大食40次、于阗34次、龟兹21次。参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3-587页。

③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4-135页。

顶多是礼仪上的屈尊而已,王朝依旧属于赵氏子孙,域外的统治者没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权力。宋朝多次受到要挟,有时候也顺从了,但做出相反的选择也不会有亡国之忧,所以宋朝有极大的选择自由,而这种选择自由是由自主性所缔造的。

这就是一个失落的大国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与进攻性的中原王朝相比,宋朝厉行防御,个性软弱,不惜以巨额的物质财富来交换和平,称谓上的低人一等更不在话下;另一方面,宋朝又非弱国,而是极其坚韧,无数次挫败大国的进攻,保住了在自己领土上自由统治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统一中原的王朝形象就这样被宋朝颠覆了。

三 波兰:上帝的游戏场

宋朝并不寂寞,它的悲剧总在不同的时空中重演。现在,让我们放宽历史的视界,把目光投向几千公里之外的上帝的游戏场^①——波兰。

西斯拉夫人的波兰曾经辉煌过,公元15、16世纪是它的黄金时代。公元1410年,波兰-立陶宛^②在格伦瓦尔德大败不可一世的条顿骑士团。1466年,波兰赢得十三年战争的胜利,条顿骑士团从此一蹶不振,不再对波兰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到了1490年,波兰、立陶宛、捷克和匈牙利均在雅盖洛王朝的统治之下,这是波兰的财富、武功和威望向外辐射的结果。几十年之后,波兰发动立沃尼亚战争,击溃由“恐怖的伊凡”——伊凡四世(Иван IV)——领导的莫斯科大公国军队,将立沃尼亚纳入版图。总之,全盛时期的波兰具备了大国的特质,^③是一些国家争相仰赖的靠山,这足以让它国徽上的白鹰熠熠生辉。

在许多欧洲大国尚未觉醒之际,波兰显然是早熟了。然而,它的荣耀很快在近邻国家的迅速崛起和强力干涉中黯然失色。从17世纪中叶起,波兰的主权屡屡遭受大国侵犯,不得不一让再让,直至1795年从地图上消失。在这之后,波兰又经历了几次重生的历史,这些历史和夹杂其中的寂灭的历史一样,都由大国来书写(参见表5)。

① 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把波兰看做上帝的游戏场。这一比喻的含义和来源,参见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xv-xvi.

② 1386年,波兰和立陶宛实行王朝联合。在这个联合体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波兰,立陶宛精英逐渐波兰化。其后,波兰-立陶宛几经分合。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签署《卢布林条约》(Treaty of Lublin),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正式建立,波兰和立陶宛拥有共同的议会和相似的政治制度。

③ 杰克·S.利维(Jack S. Levy)把波兰排除出大国行列。参见Jack S. 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495-1975*,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p.46. 不过,芭芭拉·杰拉维奇(Barbara Jelavich)则承认波兰一度是大国,参见Barbara Jelavich, *A Century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1814-1914*,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64, p.4.

表5 波兰领土面积的变化(1492-1945年)^①

时 间	领土面积(平方英里)	时 间	领土面积(平方英里)
1492 年	435 547	1807 - 1813 年	60 157
1634 年	386 719	1815 - 1874 年	49 609
1686 年	286 524	1874 - 1918 年	-
1773 年	204 024	1921 - 1938 年	152 234
1793 年	84 000	1939 - 1945 年	-
1795 - 1807 年	-	1945 年	122 139

跟宋朝没什么两样,17世纪中叶后的波兰滑向防御性现实主义,背离了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生存法则,这是悲剧的根源。在下面的论述中,本文不打算染指波兰1795年以后的历史,——那段历史只不过是先前逻辑的延续而已,——而只关注这个时间点之前波兰及其与相关国家间关系的来龙去脉。

(一)自由的代价

长久以来,波兰一直是贵族的天堂。在这里,贵族可以自豪地宣称,跟他们有关的事,没有什么能少得了他们。贵族是国家的统治者,国王由贵族推举产生,听命于贵族,充其量只是贵族的橡皮图章。

在等级君主制时期,贵族手握特权,是三个等级中权力最大的。肇始于公元1505年的贵族民主制继续赋予贵族绝对统治波兰的权力。“没有顾问和地方议会代表的一致同意,国王和他的继承人在今后不能做出任何新的决定。”^②如果以贵族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这种制度,那么,波兰将称雄欧洲。1569年,波兰至少有50万贵族,占总人口的6.6%;17世纪晚期,这一比例上升到9%,18世纪还要更高。^③1652年,波兰贵族甚至创设了议会的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制度,即任何一个议员反对,议案都无法通过,在全国议会(*Sejm*)和地方议会(*Sejmiki*)均是如此。不过,这种波兰式民主越有生命力,就越致命,因为波兰贵族越捍卫黄金般的自由,就越不会把国王放在眼里,强大的中央政权就越无从谈起,就越不可能组织一支强大的常备军。这就是伏尔泰(*Voltaire*)所说的“一个波兰人——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人;两个波兰人——一场争

①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 1)*, pp. 23-24.

② 转引自刘祖熙《波兰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2页。

③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 1)*, p. 215.

吵;三个波兰人——波兰问题。”^①波兰有几位国王,如斯蒂凡·巴托雷(Stefan Batory)、齐格蒙特三世(Zygmunt III)和奥古斯特二世(August II)等都曾试图效仿其他欧洲大国,创建君主专制,打造一支强大的常备军,但统统不过是很快就破灭的幻想——波兰贵族太爱好自由,太强大了。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宁愿选外国人当国王。1573-1795年,经波兰贵族选举产生的11个国王中,其中就有7个是外国人。^②可是,他们却信誓旦旦地表示,为了国家,他们将奉献自己的生命和财富!1792年5月22日,大敌当前,波兰的贵族终于不再吝啬,授权国王全权指挥军队作战,仅保留最后缔结和平条约的权力,^③无奈积重难返,回天无力。自由的贵族,悲惨的波兰!

对于自由否决权的致命弱点,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自然心领神会。它们非常清楚:一旦波兰废除自由否决权,上帝就会帮助波兰;操纵波兰命运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永远让自由否决权这个幽灵在波兰上空徘徊。公元1720年,俄罗斯和普鲁士在波茨坦缔结协定,共同确保波兰的政治制度维持不变;1726年,奥地利成为第三个“保证人”。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the Great)及其能臣们当然深谙此道,他们在多次通信中表达了如下看法“波兰保持现有的无政府状态是陛下的利益所在”要反对这个国家的政府发生任何变化。^④任何要改革、废除自由否决权的想法和行动都让三个“保证人”狂躁愤怒不已,毫不留情的干涉必然随之而来,直至恢复原状为止。这种局面多次出现,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波兰1791年5月3日通过新宪法,取消自由否决权,代之以多数表决制,结果招致三个“保证人”的直接武装干涉,领土再次被瓜分。

(二) 无解的困局

在残酷的时代里,波兰关起门来选择自由,打开门便不再有选择的自由。波兰与时代的精神背道而驰,时代便留给它无解的困局。

1. 诱人的猎物

到17世纪前期,波兰还是一个庞然大物,粮食出口大国,富庶之地,沟通欧洲东西、南北的桥梁,波罗的海映入眼帘,难怪总有国家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捞一把。普鲁

^① E. Rzadkowska, ed., *Voltaire et Rousseau en France et en Pologne*, Warsaw, 1982. 转引自[英]诺曼·戴维斯著,郭方等译《欧洲史》下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678页。

^② 刘祖熙《波兰通史》,第86页。

^③ 转引自Jerzy Lukowski,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1771, 1793, 1795*, Harlow: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9, p. 149.

^④ 转引自James Breck Perkins, “The Partition of Pol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2, No. 1, 1896, p. 83.

士最想要的是普鲁士和勃兰登堡之间的波莫瑞、西里西亚和大波兰；俄罗斯不仅要收回斯摩棱斯克、契尔尼哥夫和塞维尔斯克，还要越过立陶宛，继续向波兰进军；瑞典从1521年起就进入辉煌的瓦萨时期，到17世纪，逐渐变成军事化国家，它的目标是成为波罗的海霸主；奥地利盯着施皮茨（Spisz为波兰语；德语为Zips，译为齐普斯）。自17世纪中叶后，机会源源不断地涌现。最初的机会来自波兰国内危机。此时，这些野心勃勃的国家对此消彼长之道驾轻就熟：在波兰陷入国内困境的时候，把它打压成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这一旦成为现实，进攻的机会随时可以发现，如想付诸行动，只要一个借口就够了。于是，它们对波兰的入侵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1763年是波兰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七年战争结束，波兰周边的大国可以着手实施蓄谋已久的兼并、占领波兰的计划。俄罗斯不在此列，因为波兰早已成为它的附庸，它在潜意识里把整个波兰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愿看到其他国家染指波兰。波兰向俄罗斯一边倒的事实确实困扰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一段时间，这让它们投鼠忌器，但波兰的诱惑实在太大，以至于德意志人甘愿铤而走险。1768年，奥地利率先行动，占领了波兰自1412年以来在匈牙利拥有的一块飞地——施皮茨（齐普斯），其理由是防止瘟疫扩散，防止巴尔党人袭击。1769年，普鲁士步奥地利后尘，派兵进入共和国。随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又各自占领了一部分波兰领土。在既成事实面前，俄罗斯不愿为了波兰而开罪普鲁士和奥地利，转而接受普鲁士兜售的瓜分波兰计划。如果说第一次瓜分波兰还有一块人道主义的遮羞布的话，那么，第二、三次瓜分波兰再也不需要哪怕一点点堂而皇之的理由，而只需要找到合适的时间，这两次的时间分别在1793年和1795年，原因只有一个：不能让手里的猎物跳出掌心。

2. 持续的进攻

曾几何时，波兰是欧洲战场的常胜将军，不畏惧任何对手。然而，在与时间的赛跑中，波兰却消耗了积累几个世纪的资本；相反，它昔日的手下败将，如普鲁士、俄罗斯等脱颖而出，赢得领土、人口、财富和尊重，这一切，都是在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其中当然有波兰的“贡献”：只要波兰稍呈颓势，它身边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就迫不及待地发起进攻。

1654年，俄罗斯利用波兰境内哥萨克起义之机，发动侵略战争。战争打了13年，终因双方消耗过大而结束。根据停战协定，俄罗斯收回斯摩棱斯克、契尔尼哥夫和塞维尔斯克，乌克兰的第聂伯河左岸和基辅、扎波罗热归俄罗斯。1655年，在波兰和俄罗斯作战时，瑞典进攻波兰，波兰一度情势危急，后来在其他大国的帮助和干涉下，并得益于勃兰登堡倒戈，才得以战胜瑞典。不过，这场战争倒像是一场洪水（potop）冲刷

着波兰: 战争在波兰国土上展开, 这使它损失惨重, 不仅如此, 波兰还丧失了立沃尼亚的大部分土地和普鲁士。1672年, 奥斯曼帝国入侵波兰, 幸有奥地利、俄罗斯等盟友相助, 波兰才能完好无缺。

经过几十年战争的洗礼, 到了18世纪初, 武功卓越的普鲁士和俄罗斯已经完全不把波兰放在眼里。1700-1721年, 波兰作为进攻性联盟的一方, 卷入北方战争, 但它如此不堪一击, 以至于只能向盟友求救, 这就难怪它的保护人——俄罗斯拒绝它参加和会的要求, 而且拒不交还里夫兰。当巴尔党人不满俄罗斯的干涉, 起兵反抗时, 俄罗斯将巴尔党人及其支持者奥斯曼帝国一起打败, 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参与其中, 与俄罗斯一起瓜分波兰。

3. 贪婪的强者

与统一的中华帝国不同, 欧洲大陆早期不存在强大到足以征服这块大陆的国家, 以后便不再有大一统的机会——这是一片国家丛生的森林。到了17世纪50年代, 波兰的几个邻国已经成长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 实力高出波兰一大截。普鲁士——这个曾经在1454年并入波兰的国家——已经和勃兰登堡结为一体, 尽管暂时为三十年战争而稍感失落, 但很快重整旗鼓, 反而比以前更可怕, 甚至走上军国主义之路。俄罗斯崛起的进程曾经受挫于波兰, 不过, 在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的一个世纪后, 俄罗斯还是具备了主动进攻波兰的能力和勇气, 这表明, 俄罗斯已经追上来, 并且很快压倒波兰。瑞典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于17世纪初中断在波兰手中, 这激发了它的复仇决心。奥地利和波兰一样早熟, 一旦从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中脱身, 就有机会在波兰身上实现AEIOU(拉丁语“Austriae est imperare omni universo”的缩写, 意思是“世间万物皆臣属于奥地利”)的梦想。奥斯曼帝国向北扩张自有可行性, 它知道, 山脉不构成多大的障碍, 只要控制几条河道, 就可通往多瑙河流域, 攻下中欧。

就本能而言, 这些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都不愿意停止进攻的步伐, 它们之间的敌意和战争是难以避免的, 因而, 留出一条波兰这样的缓冲地带多少能暂时确保相安无事, 避免多败俱伤。基于以上逻辑, 被夹在一群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中间的波兰至少可以安慰一下自己: 一个独立的波兰符合整个欧洲的普遍利益。但是, 这种浪漫主义情怀不能持久地得到周边大国的认同, 它们之间的敌意迟早会被从波兰那里唾手可得的利益而冲淡: 利益均沾是它们的共同愿望。

4. 虚谎的承诺

在欧洲这片国家丛生的森林里, 波兰要找到(某些时候)不针对它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并非难事: 某些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为反对另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而站

在波兰一边,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几个世纪以来,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法国一直扮演着波兰忠实盟友的角色。^①然而,孱弱的波兰无法获得把矛头对准自己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同情,更不用说尊重了,它们要的是屈从的波兰,保护的承诺只不过是一纸谎言。由于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Stanisław Poniatowski)与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关系密切,1764年,俄罗斯派军队包围波兰议会,把他推上波兰国王的宝座。这位女沙皇需要一个傀儡,以便更好地控制波兰,波尼亚托夫斯基便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新国王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建设强大波兰,这就超越了女沙皇所能容忍的底线,于是,武装干涉在所难免。在需要什么样的波兰这一问题上,普鲁士和奥地利跟俄罗斯的立场一致:要么屈从,要么兵戎相见。瑞典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战役中惨败,从此丧失了大国的地位,不再参加针对波兰的“游戏”。1672年爆发的波土战争延续到1699年结束后,奥斯曼帝国也不再对波兰构成威胁,为了对付俄罗斯,它反而支持波兰。不过,来自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的支持无力改变波兰的命运。同样,法国对波兰的支持也变得口惠而实不至。七年战争后,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远不如以前,波兰的厄运慢慢降临。在路易十四时期,未经法国同意,瓜分波兰绝无可能,但现在,法国再也没有能力像一个世纪前那样,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欧洲大国。^②对于波兰而言,1756年的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把法国和奥地利拴在一起,自己在法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大不如前,这无疑是在雪上加霜。如此一算,没有大国撑腰的波兰要应付三个欲壑难填的邻国,其结果,除了失败,还是失败。稍可告慰波兰的是,崛起于波兰亡国之后的拿破仑也拉开了重建波兰的序幕。

5. 悬殊的军力

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瑞典和奥斯曼帝国这5个国家都或早或晚地动用专制手段,成功建立和武装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如果说伊凡四世使莫斯科公国的军力大幅提升,那么,彼得大帝则开创了一个里程碑:建立现代俄罗斯军队。在他去世时(1725年),俄罗斯的常备军已经达到21万人,另有10万名哥萨克骑兵。^③此后,这支军队长期保持在30万人左右的水平。^④在1618年霍亨索伦家族整合勃兰登堡和普鲁士之际,也许没有谁能想到普鲁士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沙箱”能迅速崛起。制造这

① 法国单方面帮助波兰不能称之为两国合作。

② James Breck Perkins,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p. 76; 路易十四在位时间从1643年5月14日至1715年9月1日。

③ [美]尼古拉·良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著,杨焯、卿文辉译《俄罗斯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

④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第95页。

个奇迹的是几代尚武的君王。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留给继任者的是一支人数达3万人、训练有素的常备军,^①这个数字以后持续攀升,1740年为8万多。^②腓特烈大帝接过接力棒,把普鲁士军队打造成拥有近20万人^③的欧洲最强的职业化军队。三十年战争后,哈布斯堡王朝的常备军不断膨胀,从1650年的约5万人^④到玛丽亚·特丽莎(Maria Theresia)时期的近10万人,再到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时期的近30万人。^⑤经过卡尔十一(Karl XI)改革后的瑞典军队有3.8万-4万人,还有2.5万雇佣兵。^⑥处于巅峰状态的瑞典兵力则达到11万人之多,^⑦后来有所下降。在后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the Great)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禁卫军人数在3万-4万之间,各省的部队则有5万-8万人。^⑧另外,为了保护漫长的边境线,奥斯曼帝国也招募边境部队投入战斗和其他工作。

反观波兰,由于中央政府和国王处处受制,常备军人数总是少得可怜。从扬·卡齐米日(Jan Kazimierz)开始,波兰军队的规模固定在1.8万人,扬·索别斯基三世(Jan III Bobieski)时一度增加到5.4万人,^⑨但这个数字不具有可持续性。1717年,战争中的波兰增兵至2.4万;1764年,七年战争刚结束,波军仅有1.2万人。^⑩长久以来,1万多是波兰军队人数的常态。1792年,觉醒的波兰终于可以动员5.7万人加入军旅行列,不幸的是,俄罗斯正准备用10万军队来对付他们。^⑪

(三) 弱者的病征

如果并不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比较,只考察17世纪中期前后的波兰,我们很难得出这个昔日的文艺复兴明星已然衰落的结论。波兰的衰落,表现在这个地区的

① Francis Ludwig Carsten, *The Origins of Prus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 p. 271.

② [美]唐纳德·卡根、史蒂文·奥兹门特、弗兰克·M. 特纳著,袁永明等译《西方的遗产》(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

③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第95页。

④ [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成、龚晓庄译《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页。

⑤ Hanns L. Micoletzky, *Österreich. Das große 18. Jahrhundert*, Vienna 1867, pp. 227, 336; 转引自[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337、338页。

⑥ Franklin D. Scott, *Sweden: The Nation's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 221.

⑦ [英]J. S. 布朗伯利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六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3页。

⑧ Virginia H.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7, pp. 49, 55.

⑨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 1)*, p. 478.

⑩ Jerzy Lukowski,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1771, 1793, 1795*, p. 10.

⑪ Jerzy Lukowski,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1771, 1793, 1795*, p. 148.

其他大国在波兰原地踏步之际,从它身边呼啸而过。此时,又恰逢主权国家体系兴起。虽然《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近现代国际政治肇始的标志,但战争与和平的法则依旧,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还在延续。在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不断输出的战争中,波兰的病征显露无遗:主权不时受到干涉,内政外交的自主性丧失,辽阔的领土被蚕食鲸吞,人民成为域外统治者的统治对象。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再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17世纪后半期,波兰遭遇一系列军事失败,主权和自主性也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完整无缺,这是索别斯基的短暂胜利所无法扭转的趋势。^①1655年,瑞典大举进攻波兰,勃兰登堡站在瑞典一边,逼迫波兰于1657年签署《韦拉瓦条约》(Treaty of Wehlau)。根据该条约,波兰最终放弃对东普鲁士的宗主国地位。在为结束战争而安排的《奥利瓦条约》(Treaty of Oliva)中,波兰承诺不改变波兰普鲁士的宗教现状。1667年的《安德鲁索沃条约》(Treaty of Andrusovo)则规定,将基辅和乌克兰交给俄罗斯人,理论上是20年,实际上是永久。而根据1686年的《莫斯科条约》(Treaty of Moscow),波兰保证不改变境内东正教教徒(主要集中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宗教环境。

进入18世纪,在列强的紧逼之下,波兰选择了俄罗斯作为其靠山。1709年,深陷北方战争泥潭中不可自拔的波兰一头倒向俄罗斯,正是在俄罗斯的扶持下,奥古斯特二世重新登上大位,波兰从此沦为俄罗斯的附属国。

在以后的50多年里,俄罗斯确实没让波兰失望,有了俄罗斯,波兰的国内秩序得以稳定下来,其他大国也不敢随便打波兰的主意。这种依附于一个大国的生存模式看起来要比多国“乱波”要好些,毕竟,秩序和安全更有保障,也许最重要的是,那片辽阔的土地还原封未动。当然,波兰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在享受俄罗斯的庇荫和恩泽的同时,让俄罗斯来替自己做主。半个多世纪年后,俄罗斯终究还是经受不起普鲁士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诱。要知道,这个“伟大的推销员”从1709年开始就不停地四处推销瓜分波兰的计划,终于在1772年打动了叶卡捷琳娜大帝。于是,波兰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发生了,20多年后,这一幕又继续上演,直到波兰再也没有一寸舞台可供演出。就这样,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说,波兰像是一棵洋葱,被一叶一叶地吃掉。^②波兰能怎么样呢?它的命运早就掌握在大国手里,任由摆布,以前是一个,现在是三个(参见表6)。

① 毋宁说,索别斯基在1683年解救维也纳是波兰最后的回光返照。

②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 A History of Poland* (vol. 1), p. 515.

表6 波兰三次被瓜分的情况^①

次数	时间	参与瓜分的国家	失去的领土(平方英里)	失去的人口(人)
第一次	1772年	俄罗斯	35 907	1 300 000
		普鲁士	14 015	580 000
		奥地利	31 622	2 650 000
第二次	1793年	俄罗斯	96 560	3 000 000
		普鲁士	22 400	1 100 000
第三次	1795年	俄罗斯	46 330	1 200 000
		普鲁士	18 147	1 000 000
		奥地利	18 533	1 500 000

在相对实力大幅衰落之际,波兰曾寄希望于投靠大国,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凭借柔软灵活的身段、精湛的外交技巧进行周旋,以求自保。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只是舍本逐末之举,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防御性现实主义困境。

四 结论

均匀流淌的时间总是在建构不同的时代,而时代的意义就在于:其一,经由抽象而来的宏观线索,我们受益于大历史的启示,也就是说,恢弘的背景是洞察零碎历史的前提。其二,历史是一种结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决定论的色彩:不同的时代盛行不同的生存法则。

然而,国家行为的逻辑又远非线性。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总有部分国家游离在自己所处时代的生存法则之外。从结果来评判这些行为的价值,“错误”这样一个字眼自有合理之处。

历史永远无法拒绝错误。身处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宋朝和17世纪中期后的波兰都错误地选择了防御性现实主义,都以悲剧告终。如果宋朝选择进攻性现实主义,结果会怎样?一个符合逻辑的假设是,它会使宋朝的生存质量好些,但宋朝是否还有319年的生命力却值得怀疑,因为这个数字已经超越唐朝,也超越元朝、明朝和清朝,

^① Jerzy Lukowski, *The Partitions of Poland: 1771, 1793, 1795*, pp. 100, 156, 158, 177.

在秦以后各中原王朝中仅次于汉朝。如果波兰17世纪中期后继续在进攻性现实主义道路上狂奔,结果会怎样?一个符合逻辑的假设是,它会比15、16世纪更强大,成为名副其实的欧洲大国,因为它有雄厚的基础。当然,这个假设连带解决了一个难题:自由否决权。

中国宋朝和波兰颇不一样,一个是大国,一个是弱国;一个独立自主,一个依附生存;一个坚韧而先进,一个脆弱而落后,凡此种种不仅无碍于它们共享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标签,反而为防御性现实主义贡献了多样性。从普遍的意义来看,在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始终面临困境,它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进攻的诱因,它常常遭遇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的攻击,它被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包围,它几乎无法和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合作,它的军力往往(在整体上或在关键指标上)落后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总而言之,防御性现实主义并非那个时代合适的生存法则,它生来就是苦的,注定是悲剧角色,它的践行者的生存质量堪忧。

这一结论放之人类社会的绝大部分时期而皆准,——毕竟,只是到了当代,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命运才彻底好转。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防御性现实主义时代和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衔接起来,从而勾画出一幅完整而清晰的图景。

这一结论也进一步引发了对国家的存亡和生存质量的思考。对于进攻性现实主义时代的防御性现实主义国家,我们不仅要关注它们的存亡,还要关注它们的生存质量;很多时候,生存质量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本文的解释就是一例。鉴于现有研究过分执著于存亡之道,却对生存质量置之不理,深入考察后者无疑是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之一。这是一个以实在为导向的、宏大的研究纲领,亟待勇猛精进之士奉献多元智慧。总体来说,本文只是进行了初步探索,全面、系统的研究应该包括所有时代的所有国家,国家的生存质量和人民的生活质量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是着力之处。

[收稿日期:2011-07-16]

[修回日期:2011-10-05]

[责任编辑:赵远良]

ism.

[Key Words] european integration, classical imperialism, dependence theory, world system theory, neo-gramscian school

[Authors] Cheng-Hung Lee,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Yi-Ren Dzu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Defensive Realism: The Tragedy in the Times of Offensive Realism

Li Jiangchun (99)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swer a salient but not well solved question: what is the fate of a defensive realist state in the era of offensive realism? The question can be decomposed into two sub-questions: First, what survival pressures does a defensive realist state encounter in the era of offensive realism? Second, what impacts do these survival pressures pose on a defensive realist stat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 defensive realist state encounters five survival pressures in the offensive realist context, under which two indicators are far from satisfactory and thus the survival quality of a defensive realist state worrying. The author makes a case study, with evidences from the Song Dynasty and from Polan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iculties that a defensive realist state faces in the context of offensive realism.

[Key Words] offensive realism, defensive realism, state quality of survival, song dynasty, Poland

[Author] Li Jiangchun, PhD candida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The Interdependence of Factory Asia

Lin Guijun Deng Shizhuan (124)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aper is to employ the trade dependence index to study the interdependencies within Factory Asia, based on the data of trade in components and parts among the relevant econom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size of Factory Asia has exceeded Factory America and Factory Europe, and emerged as the largest factory in the world. The evidence also shows that Factory Asia's internal trade in intermediate input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Europe both in quantity and share, indicating that Asia's integration in production is higher. Major Asian economies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Factory Asia's production activities. To rank the importance of each Asian economy in this